

文苑縱橫談

8



1206/29

2050/25

文苑纵横谈

〔8〕

山东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济南

946529

文苑纵横谈

〔8〕

*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7.625印张 168千字

1983年7月第1版 1983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100

书号 10099·1716 定价 0.69元

目 录

史笔淋漓传人物	王安 李庆甲 (1)
——朱东润教授和传记文学	
• 上下而求索	齐 瑾 (18)
——王季思教授治学散记	
王统照散文创作论	杨洪承 (27)
学者 教徒 作家	宋益乔 (47)
——论许地山的创作个性	
熊佛西的戏剧创作述评	韩日新 (69)
论贺敬之诗歌的艺术成就	郭久麟 (87)
新的起点 新的收获	邢庆祥 (110)
——读鲁彦周同志的中篇小说	
文学批评贵在实事求是	吴振邦 高凤胜 (124)
——谈邱勋的小说《山高水长》	
一颗富有民族特色的艺术明珠	韩长兴 (136)
——谈《茶馆》从舞台到银幕	
谈谈艺术家的审美理想	于占德 (143)
《中国现代作家谈创作经验》	王一桃 (152)

略论秋瑾的弹词《精卫石》 郭延礼(154)

山东古代文学家评传(选登) 袁世硕 主编(173)

冯惟敏 (173)

李攀龙 (207)

史笔淋漓传人物

——朱东润教授和传记文学

王国安 李庆甲

放在我们面前的这几本文学传记：《张居正大传》、《陆游传》、《梅尧臣传》、《杜甫叙论》和《陈子龙传》，都是我国著名学者朱东润教授的著作。它们以材料充实，论述精辟，文笔清新，形象丰满，在我国传记文学中别具一格，而吸引着人们的广泛注意。我们知道，传记文学是一种特殊的文学体裁。它既有别于学术著作的专重材料、排比史实，也不同于小说的凭空虚构，概括典型。它以事实为根据，记述人物的生平事迹，但不排斥某些想象性的文学描写，反映出社会生活的历史背景和各種人物丰富多采的生活经历及其精神面貌。它既是史学，又是文学，是二者结合的产儿，成为文学苑林中独放异采的花朵。朱东润教授就是一位在我国文学百花园中热心栽培这簇花朵的专家。四十余年前，当传记文学在一般人心目中还甚为生疏的时候，他开始了脚踏实地的研究、创作。今天，在传记文学已逐渐受人重视之际，他更是“壮心不已”，尽力耕耘。筚路蓝缕作先导，史笔淋漓传人物，朱东润教授对我国传记文学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一、“替中国文学界做一番 斩伐荆棘的工作”

朱东润教授原名朱世溱，祖籍泰兴。泰兴朱氏，原是一个书香家庭，但至朱东润祖父这一代已经式微。他的父亲是个店员，因此，他在幼年度过了一段颇为清寒的生活。他从少年时代起即受业于著名古文家唐文治。由于学习勤奋，知识广博，在同窗中最受器重。唐文治先生常常以箸击几，曼声长吟：“文学要问朱世溱”。这对一个气盛的少年无疑是个很大的激励。朱东润教授青年时代曾留学英国，攻读英国文学。深厚的古文底子和英国的留学生活，对他后来传记文学的研究和创作，有着很大的影响。

一九三七年，朱东润教授应聘去武汉大学执教，开始了他的研究古典文学的生涯。朱东润教授的治学范围很广泛，经史子集，多所探及。就其著述而言，即有有关诗经、楚辞、秦汉散文、唐宋诗词及文学批评等多种多样。朱东润教授治学的一个最大特点是不囿旧说，不拾余唾，在学问的迷宫里，喜欢自辟新途。他在抗战前写的《读诗四论》就是有鉴于古人“知有经而不知有诗”，近人又“惑于欧美之旧说，以是非未定之论来相比附”而作。他写《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更是创新之举，曾为朱自清先生誉为我国“第一部简要的中国文学批评全史”。朱东润教授对传记文学的研究、创作，实在是这种力求创新的治学方法的丰硕成果中的重要部分。

早在英国求学之时，朱东润教授就对传记文学有了接触，鲍斯威尔的《约翰逊博士传》曾引起他莫大的兴趣。但是，正

如朱东润教授本人所说：“对文学的这个部门，作切实的研讨，只是一九三九年以来的事。那一年，我看到一般人对于传记文学的观念还是非常模糊，更谈不到对于这类文学有什么进展，于是决定替中国文学界做一番斩伐荆棘的工作。”

如众所知，传记文学在我国起源很早。公元前四世纪的《左传》，就在记录史实的同时，描绘了许多历史人物的形象和活动。汉代司马迁的不朽名著《史记》中的若干纪传，更是富有文学色彩。此后，历代“正史”，专述人物和史实的纪传都占了极大的比重。至于一般文人学士私家撰述的“别传”，专心记叙人物事迹为主，则与我们今天传记文学的概念更为接近。除历史著作外，古代的墓志铭、神道碑、祭谏文，行状和年谱等，都是记载各种人物生平事迹的。其中如宋代苏轼的《司马光行状》近二万字，朱熹的《张浚行状》达四万三千余字。但这类作品，显然还只是史学的材料，不是文学的传记。它们仅仅是传记文学的雏型。

直到二十世纪初，由于西方文学的影响，我国才出现了现代意义的传记文学。梁启超的《王安石评传》是中国近代最早的一部传记文学。虽然采用的是“评传”形式，把王安石的时代、生平、政绩、家庭、学术和文学等分设专章叙述，在当时毕竟别开生面，其影响至今犹存。但其后，继踵者寥寥无几。人们对传记文学的认识仍然十分肤浅，甚至在当时大学的讲台上，还出现过“传记文学——韩柳散文”这样不伦不类的专题课。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朱东润教授毅然抱着为祖国文学园地斩伐荆棘，开辟新路的愿望，投入了对传记文学的研究。

抗日战争时期的生活是艰苦的，暂迁四川的武汉大学图书馆更条件有限，特别在传记文学这一研究领域，我国还几乎是

一片空白，没有什么可资借鉴的东西。但这一切都未能使朱东润教授畏葸不前。他开始埋头“下死功夫”，从头做起。他从精读《史记》、《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入手，对魏晋六朝的“别史”做了大量的辑佚整理；他认真探讨了唐宋作家所作的碑志、墓铭、行状等在我国古代传记中的价值，并弄清了元、明、清三代“在传记文学的理论和实践上，其实是没有什么发展的”。在此同时，他又致力于探究西方（尤其是英国）传记文学的特点。他从勃路泰格的《名人传》读到当代作家的著作，从提阿梵特斯的《人格论》读到莫洛亚的《传叙总论》。举凡在当时武大图书馆能找到的英文传记和传记理论，他都一一研读。经过对中外传记文学的认真比较，他先后写成了《中国传叙文学底进展》、《传叙文学之前途》、《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述论》、《传叙文学与人格》等论文和长达十余万字的专著《八代传叙文学述论》。这些成果，阐述了我国古代传记的来龙去脉，填补了我国古代传记研究的空白，也为他自己从事传记文学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真正的学者是不会故步自封的。朱东润教授在对传记文学的研究跨出一大步之后，反而深深感到，佛家所谓“阅尽他宝，终非己分”是一句颠扑不破的名言，要想为发展传记文学出力，单靠称述古人，叙述故籍，其结果只能落得“阅尽他宝”，更谈不上继往开来。朱东润教授的传记文学的创作实践，正是他对传记文学理论研究的进一步发展；而对传记文学理论的研究又促进了他以更大的热情从事传记文学的创作。一九四三年，他的第一部传记《张居正大传》问世，在《自序》中他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我底希望，本来只是供给一般人一个参考，知道西方传记文学是怎样写法，怎样可以介绍到中国。我只打开园门，

使大众认识里面是怎样的园地，以后游览的人多了，栽培花木的也有，修拾园亭的也有，只要园地逐日繁荣，即是打开园门的人被忘去了，他也应当庆幸这一番工作不是没有意义。”确实，《张居正大传》向人们提供了传记的“一种新的写法”。这种写法，在传记文学发达的西方国家已经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但在当时中国的传记文学领域里却还十分生疏。《张居正大传》以它崭新的面目，开拓了人们的眼界，有力地促进了我国传记文学的发展。

二、写“受时代陶熔，而又想 陶熔时代的人物”

一九四一年秋，朱东润教授准备“实地写一本传记”的时候，曾为传主的选择深深地苦恼过。对传记文学来说，选择传主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它不仅在某种程度上会影响到传记的写法，更重要的是它还反映了传记作者本人企图通过传记想告诉人们些什么。朱东润教授对于传主的选择有自己的见解，他一方面认为“任何人都有自己的世界，自己的一生。这一生的记载，在优良的传记文学家手里，都可以成为优良的著作。所以在下州小邑，穷乡僻壤中，田夫野老、痴儿怨女底的生活，都是传记的题目。”但同时，他又十分清楚，一个普通人物，很难引起读者的注意，作者唯有“运用细腻的文学技巧，从人格分析方面着手，使读者对于传主的性格，感到深切的同情，然后始能了解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有独特的价值。”但要做到这样，非要十分熟悉对方、并详细占有材料不可，而对一般作者来说，除有限的几个熟悉的人以外，几乎无法做到这一点，因而实际

上也无从落笔。朱东润教授特别认为，“传记文学不仅应真实形象地反映传记主人公的一生，还必须通过传主的一生经历，给读者以有益的启示和教育。因此，他在实际创作过程中，选择的传主都是杰出人物”，都是“受时代陶熔而同时又想陶熔时代的人物，其中有的是政治家，有的是哲学家，也有的是诗人，身份尽管不同，但他们都在各自领域内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朱东润教授笔下第一个人物张居正是明代中衰时期的一位内阁首辅。从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到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的十年间，他几乎执掌了全部政权，抚内御外，富国强兵，使明代社会能在安定的政治统治下获得发展。朱东润教授在二十余万字的篇幅里，详尽地叙述了这位杰出的政治家的成长过程和划时代的功勋业绩，以及他死后所受到的打击。又以张居正的一生为主线，揭示了当时的社会历史以及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芸芸众生，为我们精心绘制了一幅明代中后期人物和历史的长卷。具有这样宏大的规模和气魄的传记文学，不仅在四十年代初的文坛上绝无仅有，就是在我国后来的传记文学领域内也是十分罕见的。

从《张居正大传》中，我们还能看到朱东润教授在选择传主时的另一些倾向，这些倾向在后来的几本传记中也是一以贯之，始终坚持。第一，他喜欢选择的传主往往又是颇多争议的人物。他的几部传记的传主，都是在各自领域内的重要人物，但后代对他们常或褒或贬，意见分歧，甚至针锋相对地存在着截然相反的意见。即以张居正为例，过去誉之者有推之为伊尹、周公，毁之者有斥之为朱温、王莽。梅尧臣是否当时诗坛盟主，陆游是否晚节有失，都有不同看法。朱东润教授认为，选择杰出人物，有利于激励读者，振奋人心，鼓舞人们积极向上，评

价上有争议，反能“给传记作者以更大的兴趣”，一旦作出准确的评价，于社会更有意义。第二，他喜欢写历史人物。作为一个文学史专家，朱东润教授对古代人物和历史比较熟悉，因而写历史人物也是很自然的。

《王守仁传》写的是哲学家王阳明，而《陆游传》、《梅尧臣传》和《杜甫叙论》都是写诗人。朱东润教授对于诗人是有所偏爱的。他曾不止一次地说过：“我总觉得诗人是最需要写成传记的，这样我们对于他的作品才能获得进一步的理解。”他认为“诗人是时代的先觉，在战争的年代里，他站在最前列，在和平的年代里，他歌颂得最嘹亮。他的丰富而深刻的感情和他的生世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倘使我们对于他的时代和身世没有切实的体会，怎样理解他的作品呢？”杜甫、陆游，人们都是很熟悉的。杜甫是唐代诗国里的“诗圣”，他的诗被誉为“诗史”。传记详细地叙述了“安史之乱”前后的社会环境如何熏陶着杜甫，杜甫又如何以他的如椽大笔把墨汁向现实社会挥洒。陆游是南宋时代爱国诗人，传记具体地描写了他在时代的感召下的成长过程，在风雨飘摇，国势可忧的日子里，用诗歌来喷泄一腔热血。梅尧臣的情况则有所不同，他不象杜甫、陆游那样在诗歌史上声名赫赫，长期来并不受人重视。但是，朱东润教授经过深入研究，深深感到他实在是北宋中期诗坛的盟主，诗歌风格由唐入宋的大变化，实乃由他启迪。他和欧阳修、尹洙共同发动了一次声势浩大的诗文革新运动，虽然后来欧阳修的声名更高，但发动之初，他显然是当之无愧的领导者。北宋诗人如欧阳修、王安石、刘敞，以及后来的苏轼都受到他的很大影响；南宋的陆游甚至称赞他“突过元和作，巍然独主盟”。他之所以为元明以后的人们所忽视，主要是因为他的诗歌同时代和

自己的身世结合得特别紧密，后人对他的时代和身世缺乏了解，自然也就无法作出正确的认识。《梅尧臣传》，正是朱东润教授为纠正历史上这一不公平的现象而作出的努力之一。他在传记中结合对当时社会矛盾斗争的分析和梅尧臣的生活经历，描述了如何在他的领导下，诗坛打开了一个新的局面，开创了出自唐诗而又不同于唐诗的宋代诗风。

朱东润教授很重视传记中人物形象的塑造。他不止一次地强调：“传记文学是史，同时也是文学；因为是史，所以必须注意到史料的运用；因为是文学，所以也必须注意人物形象的塑造。”他还特别指出：“在为诗人进行传记创作的当中，必须把树立诗人的形象作为自己的责任。”这里说的是诗人，其实他的传记莫不如此。我们读了他的传记，不仅能了解到传主一生的升沉否泰，往往还能活生生地感受到他们的喜怒哀乐，看到他们怎样在特定的时代条件下生活和斗争，“受时代陶熔而同时又想陶熔时代”。

正是由于重视人物形象的塑造，朱东润教授特别反对把人物一生割裂开来的“评传”写法。他不赞成把传主的生平、政治思想、学术观点，以及贡献成就等分设专章叙述，认为这样写法，不能塑造出丰厚的人物形象。因此，他的传记都是用纵的方法，以传主的生平为线索，按时间先后加以叙述。他的传记，不是单纯地对人物进行介绍，分析，而是展现出传主一生的丰富多彩的生活画卷，描绘出活生生的人物形象。

这里应该指出，这些传记形象而又具体地为我们再现了历史上的杰出人物，他们并不是如后来某些人们曲解“古为今用”而大搞的“历史类比”，但却含有“古为今用”的意思，因而能很好地对读者起着教育、启示的作用。特别是作者在某些传主

选择时，有意无意地紧密结合着现实时代的需要，使这一点就更突出。《张居正大传》作于日本军队的铁蹄蹂躏着我国大地的时代，作者在尾声中意味深长地写了张居正的后代为国捐躯的悲壮一幕，并用这样的话结束全书：“整个的中国，不是一家一姓底事，任何人追溯到自己底祖先的时候，总会发见许多可歌可泣的事实；有的显焕一些，也许有的黯淡一些，但是当我们想到自己的祖先，曾经为自由而奋斗，为发展而努力，乃至为生存而流血，我们对于过去，固然看到无穷的光辉，对于将来，也必然抱着更大的期待。前进啊，每一个中华民族底儿女！”这不是作者创作意图的一个很好的说明吗？

三、糅合中西，自成风格

朱东润教授的传记文学，受到西方传记文学的理论和创作熏染较多。他感到“在中国出生的传记文学的发展既然已有许多曲折，为了求得这类文字的进展，势不能不求助于国外。学术是人类共同创造的，在此路不通的时候，在外国文学的发展中，求得一些启示，一些帮助，我们并不感到羞耻，也无所用其惭愧。”正是出于这种充满自信的“拿来主义”，朱东润教授的传记文学大胆借鉴西方传记文学的长处，又糅合进中国传统的学术，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和特点。

1. 博采史料，辨伪求真

传记文学的作者有责任真实地在传中再现传主的真相，这就涉及到史料的搜集、抉择和运用。西方传记文学有多种写法，如鲍斯威尔的《约翰逊博士传》，大量描写传主的日常生活，乃至他讨论文学、讨论政治，甚至讨论栽树鬻果一切零星小事时

的一笑一颦，写得妙趣横生；但这种写法，作者非同传主在生活上有着亲密的直接关系不可。又如斯特拉哲的《维多利亚女王传》则脱去一切繁重的论证，探幽钩玄，言简意赅，在薄薄的二百几十页里，除女王的生平外，还写到了英国的政局，也有世界的大势。朱东润教授认为这种写法在当时的英国自有使人耳目一新之处，但在传记文学不发达的中国，并不很适用，他说：“本来已经简易了，再提倡简易，岂不失之太简而无法度之可守乎？”因此，他采用的是十九世纪西方那种讲究“有材料，有证据”，力求详尽，不避繁琐的写法，并且融入了我国传统的辨伪考据之学。关于传记文学的写法，朱东润教授曾有一个很生动的比喻：“在为人画相的时候，中国人常以颊上三毫的故事自诩，但是西方的画师常常要化费多少的岁月，为画中的主人精心描绘。是那一种办法好些呢？我认为精心的描绘是好的，而颊上三毫祇能捉到被画者一刹那间的神态，而不能给我们一幅精心的描绘。”朱东润教授的传记，在搜集材料方面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撰写的《陆游诗选》、《陆游研究》和《梅尧臣诗选》、《梅尧臣集编年补注》，就是他写作《陆游传》和《梅尧臣传》的准备工作之一部分。他还特别注重对材料作详尽的考订和识别，例如关于陆游晚年同权贵韩侂胄的关系，《宋史·陆游传》载其“晚年再出，为韩侂胄撰南园、阅古园记，见讥清议。”刘壎《隐居通议》更是说得煞有介事，说陆游本欲高蹈，“一日有妾抱其子来前曰：‘独不为此小官人地耶！’乃降节从韩侂胄游。”朱东润教授经过考证，弄清这些关于陆游躁进求媚的记载失实，陆游乃是在“一致对外的基础上”，为了抗击异族，收复失地才和韩侂胄接近的，这就为正确叙写这一段公案扫清了道路，使陆游这位爱国诗人的形象更可信、具体。在搜集材料，审订真伪时，

朱东润教授固然也重视发掘历史记载中的某些罕见材料，但他更主张要依靠传主本人的著作。他强调“以本人底著作，为本人的史料”，“因为传主关于自己的叙述，总是比较可靠一些”。例如欧阳修的《梅圣俞墓志铭》、《宋史·梅尧臣传》和《宣城梅氏家谱》，一直为学者视作了解梅氏生平最可信之史料，朱东润教授却从梅尧臣本人著述中钩玄探幽，发现、纠正了这些材料中的不少错误，弄清了同梅尧臣“交游三十年”的欧阳修所作的墓志铭，有不少故意作伪之处：墓志铭不提梅氏一生没有考中进士；称梅氏“为人仁厚乐易，未尝忤于物”，而隐讳其“郁塞愤惋”、敢于斗争的性格；回避梅氏后来同范仲淹的矛盾。他认为这些都出于欧阳修为梅氏子孙求取门荫的老谋深算，倘若误以为信史，难免走入歧路。在传记内容中，朱东润教授也尽量引用传主的原著，因此，他的传记考订精策，史料丰富，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2. 客观辩证地塑造人物形象，描写出人物性格的发展变化。

传记文学虽然不同于一般的文学作品，但传记文学中的传主，同一般文学中的主人公一样，是作者创造的结果；所不同的是，传记文学必须严格地在史实的基础上进行这种创造。因此，能否真实地反映传主的本来面目，就取决于作者的认识同史实是否符合。朱东润教授很注意客观地辩证地为人物作传，他说：“材料不够必须知道如何搜求；传说太杂必须知道如何辨别，尤其重要的必须知道如何掌握分寸。进行创作的时期，对于传主不会不产生热情，但是这些自发的热情，往往会使我们失去应有的衡量。我们推许诗人同情人民吧，可不要忘去他出身的阶级，不可能使他和人民打成一片；我们歌颂他爱国吧，

可不要忘去这里常常有个人考虑的成份。从另一方面讲，我们进行批判，也不要忘去传主只是数百年以前的人物，我们不应向古人提出现代的要求。”他擅长把人物的经历同时代的变迁揉合起来叙述，深探传主的内心世界，写出置身于时代洪流之中的人物的思想、性格及变化。例如张居正这个复杂的历史人物，誉之者有推之为伊尹、周公，毁之者有斥之为朱温、王莽。朱东润教授对言过其实的颂扬和事失其真的诋毁一概不取，分别写出张居正在各个时期的功过，比较真实地描绘了一个“受时代陶冶而又想陶冶时代”的地主阶级政治家。再如杜甫，有人推崇他是“人民诗人”，也有人一口咬定“他站在地主阶级、统治阶级的立场上，为地主阶级服务，为统治阶级服务”。朱东润教授不作简单的肯定和否定，而是从杜甫的实际经历和作品出发，对杜甫一生各个阶段的立场、观点作出中肯的分析。指出“奉儒守官”的人固然不可能是“人民诗人”，但在特定环境下，他也可以同人民的利益一致，乾元二年的杜甫，就够得上“人民诗人”的称号。对传记中的次要人物，他同样坚持客观分析，如《梅尧臣传》既肯定了范仲淹主张革新的进步立场和抵御西夏的功绩，也批评了他执政期间用人不当、教子无方，造成了庆历年间革新派的败势。不囿旧说，不作主观的偏袒，从实际材料出发，用发展观点立论，大胆直抒己见，是朱东润教授传记文学的重要特色。

3. 紧密结合传主的身世经历，描绘其特殊的贡献和成就。

朱东润教授的传记文学一般都由两条线索展开叙述：一条是人物的经历，包括其思想、性格的发展变化；另一条是传主在各自领域内的贡献和成就。人们的一生，即便是杰出人物，不会全部是可歌可泣，或都富有意义。这就需要运用材料时